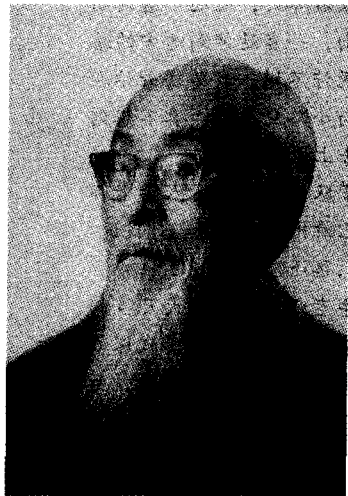


□赵金钟

冯友兰： 跋涉金色荒滩的 三十年



毛泽东的客人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，冯友兰与毛泽东没有联系。共和国成立之后，想要实现“建国梦”的他必须同毛泽东打交道。第一次交往给冯友兰的感觉是“像雨又像风”，有酸也有甜。毛泽东说的一句话，他听了老大不快。后来经过30多年的磨练，他终于理解了那句话的含义。一个会开车的朋友告诉他，开车开到熟练的时候，车就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车的四个轮子，就像自己的两条腿，来往走动，不出差错，这就是“化”。这使冯友兰懂得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。光学会些词句不行，要“化”。“化”了才能很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和哲学研究中去。而这又绝非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。所以，他所说的在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写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实之词，故回以“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”。

在整个知识分子中间，毛泽东似乎对哲学界人士更感兴趣。1957年4月，“大鸣大放”正处于热潮之中。11日毛泽东请他去吃

午饭。

同年，毛泽东发表了重要的讲话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，这是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。冯友兰此时已由四级教授升至一级教授，且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。当时政协正在开会，委员们便列席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，听了毛泽东的讲话。接着，冯友兰又应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。分组讨论时，恰与毛泽东在一组。小组会议在毛泽东家里开，由他主持。开会中间，毛泽东让冯发言。冯提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，说按照现在的讲法，有些很难讲通。毛泽东说：“那是简单化了，不可以简单化。”散会的时候，毛拉着冯的手说：“好好地鸣吧，百家争鸣，你就是一家嘛。你写的东西我都看。”看来，在“鸣放”那一段日子里，毛泽东对冯友兰还是很信任的。

1964年，全国政协委员会开大会，陈毅主持，冯友兰在大会上讲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和计划。闭幕那天，毛泽东来了。照相的时候，冯友兰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。

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：“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。”冯说：“主席比我大。”毛说：“不行了，我已经露出了老态。”他又问了一遍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进行的情况，并说：“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，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。”冯说：“我只能写中国的，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。”毛又说：“对于孔子，你和郭沫若是一派。”

冯友兰这一次与毛泽东接触，感到非常愉快，毛泽东像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同他交谈。1965年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。闭会的时候，毛泽东又接见了代表们。他亲切地握着冯友兰的手，微笑着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哲学史新编的进展情况。摄影师拍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。

不久便开始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毛泽东忙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事去了，顾不上冯友兰了。冯友兰从此也再难见毛泽东了。那时，以冯友兰的学术影响，他首当其冲地被扣上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罪名，失去了行动就医等一系列的自由和权利。70多岁的老人了，还



被强制去劳动，并被关进造反派的“劳改大院”，有病也得不到治疗，境况极其凄惨，几乎一命呜呼。儿女们因他受到牵连，孙儿们甚至被幼儿园开除了“园籍”。1968年秋，情况忽然好转，红卫兵通知他可以回家了。冯友兰突然有一种“皇恩大赦”的感觉。为什么会对他这样宽大呢？原来又是毛泽东在关心他。毛泽东说：“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，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，我们只懂唯物主义，不懂得唯心主义，如果要知道一点唯心主义，还得去找他。”毛泽东以作反面教材的方式把冯友兰保护了起来。从此，冯友兰的境况便逐渐得到了改善。1971年，当时的重要人物谢静宜到北大见冯友兰，说：“毛主席派我向你问好。”冯友兰感动不已，即兴赋诗一首，托谢转呈毛泽东。诗云：

善救物者无弃物，
善救人者无弃人。
若有东风勤着力，
朽株也要绿成荫。

此时，冯友兰对毛泽东已是感恩戴德了。无论毛泽东让他做什么，他都坚决执行。

弹不准的琴弦

1973年，批林运动又转向了批孔运动。不仅批孔，还要批尊孔。冯友兰顿时紧张起来，觉得自己又要成为“众矢之的”了。这时他已78岁高龄，再蹲回“牛棚”，遭受喊打，快要散架的骨头还能承受得起吗？正在他忧悒之际，毛泽东写了首批判郭沫若《十批判书》中尊孔思想的诗：

郭老从柳退，
不及柳宗元。
名曰共产党，
崇拜孔二先。

毛泽东曾经对冯友兰说过：“对于孔子，你和郭沫若是一派。”郭沫若既受批判，自己还能逃脱吗？左思右想，上下权衡，冯友兰思想终于转了一个弯：何必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，跟党中央对着干呢？我和大家一同批孔批尊孔不就没事了吗？他的大脑中又浮现起胡适当年在北大课堂上说的话：“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！”

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，冯友兰不再蹲在家里被动挨批，而是主动出去“以攻为守”。他先后在哲学系全体师生和北大老年教师批判会上作了《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》及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》的发言，深受群众的好评。不久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便将两篇发言稿拿去，在同年第4期上同时发表。接着，《光明日报》又连续转载了这两篇文章，并加上了“编者按”，肯定了冯的“进步”。紧接着《北京日报》又原封不动地转载了《光明日报》的按语和冯的文章。这一切都是在冯友兰无法控制甚至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，他当时只觉得有点蹊跷。

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。赞扬信、鼓励信从大江南北、塞外边陲雪片儿般飞来。在逆境中受到吹捧，冯友兰心中多少产生了点飘飘然的感觉。于是他更加努力，追求“进步”了。

“文革”时期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：“小报抄大报，大报抄梁效。”这个“梁效”就是当时北大、清华两校成立的大批判组。冯友兰是“顾问”。请他出山当顾问是毛泽东的主意。当时有一个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送他阅圈，他针对文件上所列孔子言论和注解

作了批示，大意是将冯友兰和魏建功吸收到两校大批判组当顾问，史料和文字可以请教他们。“梁效”（两校）班子成立后，冯友兰曾帮他们查过一些成语、典故的出处。有时也推荐一些古书的意义。还随江青、迟群、谢静宜他们在津京一些工厂、农村参加大批判会和参观，但涉及一些大问题，则没有他参加的份儿。他只不过是江青集团用以装点门面的花瓶而已。

1974年6月中旬，谢静宜问冯友兰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出去一趟。自“文革”以来，他的行动受限制，还没有出过北京，就说可以。直到坐上火车谢也不告诉他去哪儿。下站的时候，熟睡的他被人叫醒，才发现是天津。第二天，江青在天津召开了一个会议。冯友兰因丹毒急性发作住进了医院，一直住到6月底，老伴才知道，把他接回北京。

躺在病床上，冯友兰思潮滚滚，想小靳庄的农民都在写诗批儒，我这个知识分子不能写吗？于是随口吟了几首，让护士记下来。以后又以这种方式吟了许多首。这就是1974年9月14日，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的《咏史二十五首》。这些诗再一次为他赢得了声誉，但也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。其中的第十首诗是写武则天的。冯友兰当时认为，武则天做皇帝这一行为，是对儒家的三纲五伦的直接反叛。若说反儒，她应该是最彻底、最坚决的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居然成了替江青当女皇鸣锣开道的“号角”，成为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《“梁效”罪证材料》所列冯友兰的第二大罪状。

1974年1月，中央规定的批林批孔参考材料有冯友兰的那两



篇文章。1月31日晚,迟群、谢静宜代表江青送给冯友兰《鲁迅批孔言论辑录》线装书一函。这成了《“梁效”“罪证材料”所列冯友兰的“罪行之一”。

1976年8月4日,冯友兰因避震住在临时搭起的防震棚里。晚10时许,周培源、魏建功、迟群等陪江青来看望他。他已经睡了,人们把他叫了起来。江青进入棚子,坐了几分钟后说:“地震还要持续很久,你们都要住震棚,你能带头,很好。”友兰夫人问她身体可好,她说:“在这个时期,好也得,不好也得。”一边说,一边起身就走。外面已集聚了很多人,人们高呼:“毛主席万岁!”势若雷霆。江青能在此时此刻来看望自己,冯友兰心里感到热乎乎的。因为他一向认为江青是代表毛泽东的。毛主席在危急时刻还想着他,这是多么荣幸啊!

没想到,江青的这次深夜来访,又给他带来了麻烦。第二天,北大宣传橱窗内贴出了江青与冯友兰、魏建功在防震棚边见面的照片。这是《“梁效”“罪证材料”所列冯友兰的“罪行之三”。

这三大“罪状”,就成了冯友兰“谄媚江青”的“铁证”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许许多多受过“左”倾路线迫害的人都欢欢喜喜地平了反,而他还得在污泥中艰难跋涉。无休止的审查、形形色色的攻击缠绕他几年。建国以来所有的政治待遇被取消,电话也被拆走。子女们再次受到牵连,老伴至死也未能见到“天晴”。以至事过十余年,冯友兰九十华诞时,想着北大老人还余他与梁漱溟两人,特邀梁来参加寿庆,梁竟“因足下曾谄媚江青”而不给面子。

事情一直闹到1979年。2月27日,冯友兰再一次奉命在北大哲学系说清楚与“四人帮”的关系。这是他在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场合后进行的最后一次“说清楚”。由于一位要人的干预,“组织上”这回只让他走走场,重复一下早已“清楚”了的过程,从此不再纠缠。冯友兰本欲来个顺风就航,以在晚年能有一点稍为安静的空间和心境完成他重写哲学史的工作,没想到反而惹火上身烧了自己。看来,政治这根琴弦真正不好弹。冯友兰晚年后悔不已,毛泽东的那句“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”的话时时扣击着他的心胸。

“现在回想起来,如果我从解放以来,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,那就应该实事求是,不应该哗众取宠。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,说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。改造或进步,有一点是一点,没有就是没有。如果这样,那就是采取老实态度,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。”

冯友兰简介

冯友兰,字芝生,河南唐河人。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,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,1919年赴美留学,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、广东大学、燕京大学教授、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。抗战期间,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。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。1948年末至1949年初,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。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、印度新德里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。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。

1923年夏,冯友兰以《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》(又名《天人损益论》)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,获哲学博士学位。是年秋回国后,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《一种人生观》。1924年又写成《人生哲学》,作为高中教材之用,在这本书中,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,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。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,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,分别于1931年、1934年完成《中国哲学史》上、下册,后作为大学教材,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,称为“贞元之际所著书”:《新理学》(1937)、《新世训》(1940)、《新事论》(1940)、《新原人》(1942)、《新原道》(1945)、《新知言》(1946)。通过“贞元六书”,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,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。新中国成立后,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,接受马克思主义,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。著有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一二册、《中国哲学史论文集》、《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》、《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初稿》、《四十年的回顾》和七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等书。